

沂蒙精神：“人民就是江山”的生动见证

俞 祖 华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杭州 310018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人民”与“江山”之间的密切关联,而沂蒙精神就是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生动诠释。沂蒙精神所揭示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是抗日战争在山东战场取得辉煌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是解放战争中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打下江山的关键因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之所以垮台、国民党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建国主张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妥协政策使它失去了民心,导致“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和平建设年代,党靠群众路线这一“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长期执政,实证了“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道理。沂蒙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它表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不能变”,坚持宗旨意识“不能变”,坚持群众史观“不能丢”。

关键词:人民就是江山;沂蒙精神;党群关系;群众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6-0067-07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421}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与江山社稷之间的密切关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因人民而兴、靠人民而胜的成功密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而生”“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正是依靠沂蒙精神所体现的“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精诚团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 14 年坚持不懈的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打下了属于人民的江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团结带领人民经过 76 年披荆斩棘的开拓,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并迎来了“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使红色江山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生动见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守天下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则印证了“失道寡助”“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本文以孕育、生成了沂蒙

精神的山东根据地为重点,对抗战战争、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胜败的“民心向背”因素分别加以阐述。

一、打败日寇侵华：“兵民是胜利之本”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打江山”“守江山”的制胜法宝,在于始终“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2],把赢得民心民意、赢得人民支持、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作为重要着力点;党靠着群众工作这一“看家本领”在 76 年前打下了人民江山,同样靠着群众工作这一制胜法宝实现了长期执政。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落实群众路线、赢得人民支持、实现“为了谁”与“依靠谁”有效对接的经典样本,是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最为生动的诠释。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靠“同人民的血肉联系”、靠沂蒙精神揭示的党群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密切关联获得了执政地位。当年在山东根据地指挥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战员,高度肯定了群众工作、民心向背在赢得战争胜利中的关键作用。

收稿日期:2025-01-15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基金项目“汇流成河:沂蒙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系论”(2023-LHYM-02)

作者简介:俞祖华(1964—),男,浙江永康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又不断加大了对华侵略力度,中国军民在东北、上海、长城沿线等地进行了局部抵抗,全国范围内也爆发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民主运动。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并由此开始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则奋起进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作《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强调必须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指出只要把群众工作做好了,把“抗战的政治动员”做好了,“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财政也不成问题”,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3]480}

党中央在具体指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日军、伪军斗争时,也突出强调了广泛发动群众、动员广大老百姓并依靠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等问题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强调“游击战争必须密切与群众联系,才能生存与发展”^{[4]16}。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强调“共产党只有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当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抗战的胜利”;提出“以群众工作之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之好坏的主要标准”^{[4]136-137}。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了山东党组织存在“没有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使群众运动的基础直到今日还薄弱得很”的弱点;强调只有“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坚持山东与苏鲁战区的抗战,创造我们伟大的力量”;要求深入群众工作,“最坚决的执行中央十一月一日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并注意“真正改善群众生活,切切实实的执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武装的抗日起义”、建立300万至500万人的武装自卫团^{[4]162}。1940年1月20日,中共北方局在“对山东工作的意见”中要求把“深入群众工作”作为“山东党最大的任务”,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斗争^{[4]220-221}。

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机构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广大党员干部,坚决执行党中央的相关指示,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根据地抗日的政治动员活动大有起色,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斗争的开展与根据地的发展,并使以“党群同心、军民情深、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内涵的沂蒙精神在抗日烽火的淬炼中得以生成。担任过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的徐向前、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人,在各自的指示、讲话、报告中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都进行了阐述,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做了部署。1938年9月26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郭洪涛在苏鲁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动员民众成为抗战工作最重要之一”^{[4]47}。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东进支队来到山东,时任该师政委的罗荣桓高度重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要求“广泛地开展地方群众工作”^{[4]80},指出群众工作对根据地发展与军队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要求得群众运动的发展,首先切实保障群众利益”^{[4]288-289}。同年6月,徐向前、朱瑞奉命前往沂蒙山区,分别担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7月中旬抵达并于8月1日发出就职通电。针对当时进行的反扫荡斗争,徐向前强调“要粉碎敌人的扫荡,没有广泛的深入的艰苦的不断的政治动员,是不可能的”,要求普遍成立自卫团以至“积极动员民众参战”^{[4]171-174}。朱瑞指出:“使山东群众工作走向‘平衡、普遍、深入、统一’的发展,是坚持山东抗战第一等任务。”^{[4]439}

为了推动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调动各界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山东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努力协调各阶级人民利益,尽最大可能满足各界群众愿望,千方百计去实现各阶层群众利益,包括在经济上推行减租减息,开展经济建设,推行各种善政,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在政治上,用普选等民主的方式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倾听并采纳各界群众、各群众团体对政权工作的意见,并响应当时全国性的宪政运动;在军事上,除了扩大主力部队,还组织不脱产的自卫团与半脱产的游击小组,满足战争环境下群众对安全的关切;在文教上,要求把恢复与发展国民教育作为根据地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的重要环节,应“做到每一村都有一所学校,每一学龄儿童和成年人都受到教育,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去武装全山东的人民”^{[4]412};在作风上,要求广泛倾听群众呼声,与群众打成一片。正是山东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各级民主政权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才使广大齐鲁儿女积极支持抗战,从而使山东战场的抗战有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障。

在抗日烽火中生成的沂蒙精神是一脉川流不息的文化长河,它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其生成体现了“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沂蒙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分支,其直接源头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沂蒙精神的承载者不断体悟、坚守并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沂蒙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魂脉,党的群众路线“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在山东老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强调党“必须保持与群众最密切的联系”^{[5]192}。沂蒙精神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从沂蒙精神的两大承载主体来看,党政军各级机构的党员干部深受“得民心国家必安,失民心国家必危”的传统民本思想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则深具精忠报国、知恩图报、杀身取义等优良民风与革命传统,“我们山东的先烈,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就像田横的守义不辱,这件事就出在我们山东……这种不屈不辱的壮烈行为,很足以表现我们山东人民反抗精神”^{[4]425}。

沂蒙精神所揭示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是抗日战争在山东战场取得辉煌胜利的制胜法宝。罗荣桓在《谈抗日战争》中指出:“山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跟着共产党走”^{[6]1},“没有他们,要想夺取最后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他们的配合、支援和作为坚强的后盾,我军主力部队很难发展和壮大;没有他们的英勇奋战,山东的抗日战争史就很难写得这样辉煌”^{[6]7}。郭洪涛在《四支队在鲁南》中指出:“忘不了是群众帮我们摸敌情、当向导、送情报,更忘不了是群众帮我们打围寨、抬担架、救伤员,我们的哪一点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帮助。”^{[7]58}张赤民在总结1939年至1940年的冀鲁豫边区反扫荡斗争时指出:“我们在这一年中主要的是依赖于广大群众做了我们的靠山。”^{[8]182}

二、红色江山创立:“得民心者得天下”

沂蒙精神所揭示的党群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密切关联、山东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既是在民族战争中取得抗击日本帝国主

义斗争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是人民军队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打下人民江山的关键因素,验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如何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赢得主动?我们党依然凭借着群众工作这一看家本领,依然凭借着政治动员这一根本手段,依然凭借着“党群同心,军民情深”这一最大优势,依然凭借着人民群众全力支援这一最大底气,在逐鹿中原的抉择中把握了历史主动,在江山社稷的兴替中顺应了历史大势。为了争取民心,为了争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山东根据地的党组织、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实际行动,以“一心为民”“不负人民”的得力举措,打通“为了谁”与“依靠谁”之间的各种阻隔,铸就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以党、政、军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换来了人民群众的“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其中,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是争取人民支持的关键举措。山东根据地在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夕,就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土改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翻身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曾在山东解放区战斗过的指战员们,回忆了当年那些军民相依、鱼水情深的感人情景,回忆了山东父老乡亲全力参战支前的生动场面。谈及解放战争,粟裕在《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写道:“山东广大翻身农民却自觉自愿地为革命节衣缩食、含辛茹苦,甚至不惜毁家破产,承担着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全心全意地爱护军队,支援前线”^{[9]3}。华东野战军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几乎都是在山东境内进行的,华东野战军连同地方军政人员共30多万人,他们的衣食住用等物资供应都要依靠山东的父老乡亲供给。据统计,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四次参军运动,送出58.9万余人参军,仅1947年一年间就有29.5万余名齐鲁儿女加入革命军队;三年中有700多万齐鲁儿女参加了支前行列,将8亿5千万粮食及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使华东野战军在大兵团作战中有了有力的物资保障。具体到华东野战军组织的每一场战役中的每一次战斗,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在1947年1月2日至20日

进行的鲁南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民兵自动参战,护送军粮弹药,转运伤员,押解看管俘虏,清理战场物资,为主力部队侦查敌情,封锁消息,追捕溃逃的敌人,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参加支前的担架达6300副,大车小车1500余辆,动员民工60余万人^{[9]43}。在鲁南战役中担任华中野战军一师一旅旅长的张震东回忆道:“那时我们走到哪里,都由哪里的地方政府和乡亲们供给粮食。但山东的老乡更使我们感激,他们对我们华中野战军更比亲人还亲。”^{[9]78}在1947年2月进行的莱芜战役中,各级地方党政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动员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即达62万人,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在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的淮海战役中,参与后勤保障的民工总数在543万人,使参战的60万人民解放军平均每人有9个支前民工提供保障,支前的小推车5辆列1排可以从北京排到南京;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运出原粮300万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4.5亿斤粮食中,山东占2.3亿斤。

正是有这种党群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精诚团结,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人民革命事业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蒋家王朝覆亡:“失民心者失天下”

1949年4月24日,下野赋闲的蒋介石及其子蒋经国父子在故里浙江奉化溪口得知南京失陷的消息后,他们深感“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10]229-220}。同年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大陆,飞往台湾。他在兵败大陆后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军事的崩溃;是“党的失败”,包括党的信仰动摇、党纪松弛等;是政治上的失败,包括制度缺失、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因素;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联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国民党在大陆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他本人的下野亦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之所以垮台,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党方面而言,根本原因在于其一系列倒行逆施使它失去了民心,从而丢了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条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国民党因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而失去民心。抗战胜利前后,人民要求早日结束“训政”、实现民主建国,中国共产党方面顺应民意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但国民党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拒不履行自己一再作出的“还政于民”的承诺,也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还疯狂镇压国统区民主运动,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李闻惨案、五二〇血案、六一惨案等多次反民主暴行,使许多民主人士与青年学生惨遭毒打和杀害。李闻惨案发生后,周恩来等在给闻一多家属的唁电中指出:“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11]195}。国民党单方面召集或运作的“制宪国大”“改组政府”和“行宪国大”等政治闹剧以及对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的打压,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及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本质,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促使民革、民盟以及其他“带中间性的民主党派”从资产阶级的“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的转变,从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国民党因贪污腐败、掠夺民脂民膏而失去民心。孙中山一生关怀民生,把民生主义作为国民党政纲的重要方面。但后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只顾搜刮民脂民膏,眼里只有“民财”,根本没有“民生”。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要员趁机劫掠,他们完全不顾民生疾苦,使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变成了“劫收”,这些接收大员们全面搜刮“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被时人讽刺为“五子登科”,给收复区工商业带来了新一轮的浩劫,给民众财物造成了巨额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感叹“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即便是原本对国民党有一些好感的中小资本家,在经历“劫收”后,也转而对国民党深恶痛绝了。借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12]8}蒋介石在兵败大陆前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也承认:“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

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13]

国民党因发动内战、违背《和平建国纲领》而失去民心。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渴望摆脱战火,走上和平建国道路;在中共和民盟的相互配合下,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也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但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广大人民大失所望,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促使全国范围的反内战运动蓬勃兴起和高涨。1947年6月,李济深曾撰文指出:“我曾预言这一年内会民变四起,真不幸而言中。为什么全国同胞都在严重饥饿威胁之下?原因也很简单,是由于反动的执政者坚持其武力统一政策,他企图以武力贯彻其独裁统治权,于是他燃起内战的大火……今天大家只有一条生路,反内战!”^[14]国民党政权便是在内战所激起的全国民怨沸腾中、在席卷全国的反内战运动中、在国统区反蒋第二条战线的包围中垮台的。

国民党因对美姑息、出卖国家权益而失去民心。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为换取美援而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被时人痛批为“新二十一条”。11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该约签订为“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并号召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洗刷蒋介石所制造的一切新国耻”^[15]。

国民党因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失去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心。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重要、也是中国社会变迁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而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要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孙中山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是有一定认识的,曾先后提出过“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主张。但1927年4月南京政权建立后,虽然先后也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和法令,如1930年6月的《中华民国土地法》、1932年的《保障佃农办法原则》和《租佃暂行条例》、1935年5月的《土地法施行法》、1936年2月的《各省市地政施程序大纲》、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和1945年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土地政策纲领》等,但这些纲领、政策、法令严重背离了孙中山有关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其重心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不是把地主阶级

所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有的规定甚至还有利于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如《中华民国土地法》就根本没有提及佃农的永佃权问题,只规定在承租人死亡而无继承人、承租人抛弃其耕作权利、出租人收回自耕等情形下,不定期租佃契约可以终止。这显然是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佃农的。因为地主可以以“自耕”的名义收回佃田,以佃农不能“完全履行其义务”的名义撤回佃田。正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主张采取革命的方式,把地主阶级所占有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因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与共产党争夺农民,也曾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由于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在中国统治的社会基础,它因而不想也不愿真正触碰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只是企图以所谓“限额”的“和平”方式,使“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就是所谓的“限额”,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得到执行。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国民党失去了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之心,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并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溃败。

四、红色精神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意是最重要的执政资源,沂蒙精神正是因为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彰显了顺乎民心民意的重要性、彰显了群众工作这一“看家本领”的普遍与长远指导意义,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生成的沂蒙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广泛影响与恒久价值。

在和平建设年代,党靠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靠群众路线这一“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长期执政,实证了“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道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转向守护红色江山、建设新中国;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团结带领人民解决“挨打”问题到解决“挨饿”“挨骂”问题;从使人民实现“翻身得解放”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党的历

史任务转换相适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域下的“愚公移山”寓言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迁转。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愚公移山》闭幕词中以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寓言所说的愚公“用锄头挖去”太行山与王屋山两座大山,比喻中国共产党要挖掉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16]1102};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挖掉“两座大山”发展到推翻“三座大山”,因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17]113}。新中国成立后,“两座大山”或“三座大山”的含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我们同样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搬掉。”^{[18]70}周恩来在《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过去,我国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我们还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几十年时间,把这两座大山搬掉。”^{[18]264}在新中国搬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的语境之下,沂蒙精神被时代精神激活,并又一次在全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新中国初期,厉家寨乡党总支部书记厉月坤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发起治山治水的攻坚战,成为全国搬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两座大山的时代典型。毛泽东亲笔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19]221}这充分表明,沂蒙精神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价值系统,它将不断随着历史任务转换诞生新的精神标识,随着岁月变迁汇入新的时代内涵,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升级迭代而诞生新的时代楷模与精神事例。

沂蒙精神如一脉清流从巍巍沂蒙流出,它汇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大江大河”。它的生成具有地域性,然而其启迪关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一“党的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课题”,是关系到我们党长期执政之基的“国之大者”,因而“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20]35}。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考察山东时,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21]43}高度概括了

沂蒙精神的本质特征,以“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21]35}充分肯定了沂蒙精神的崇高价值,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21]43}深刻阐明了沂蒙精神的现实意义,其时代背景是当时全党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22]366-367}。坚持人民立场“不能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以人民作为党实现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联系群众作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坚持宗旨意识“不能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这一身份,以人民为师,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尊,把“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对象具体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小众,把服务工作具体到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一件件小事、实事。坚持群众史观“不能丢”,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清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不断激发人民的创造潜能与社会活力。

沂蒙精神永不褪色。以“一切为了人民”换来“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的沂蒙经验,在今天依然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奥秘所在、根基所在、力量所在。只要我们党像当年努力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那样,千方百计去实现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推进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像当年带领人民打江山、帮助人民“翻身得解放”那样,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像当年各级党组织对老区群众饱含深情那样,时刻把群众的疾苦、需要放在心上,人民就会像当年沂蒙儿女、像当年支前民兵那样“跟着共产党走”,从而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N].求是:2019(14).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常连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抗日战争时期档案资料选编(1):第7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 [5] 常连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抗日战争时期档案资料选编(5):第1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 [6] 常连霆.山东抗战口述史: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 [7]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根据地历史资料汇编:第3册[M].内部资料,2016.
- [8] 常连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抗日战争时期报刊资料选编(1):第14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 [9]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根据地历史资料汇编:第16册[M].内部资料,2018.
- [10] 蒋经国.蒋经国自述[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4.
- [11]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083.
- [12]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M].内部资料,1957.
- [13] 宋希濂.回忆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N].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4] 李济深.求生存唯有反内战[N].民潮:1947(7).
- [15] 评蒋美商约[N].解放日报:1946.11(26).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20]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1] 习近平.革命老区是党和军队的根[M]//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

Yimeng Spirit: A Vivid Testimony to “The People Being the Country”

YU Zuhua

Institute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imes Featur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 that “the country i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 profoundly expound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Yimeng Spirit is a vivi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statement. The Party-masses relationship of “complete harmony and a shared destiny, as revealed by Yimeng Spirit, is the key to the brilliant victory in the Shandong battlefiel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s well a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people’s defeating the reactionary Kuomintang and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country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In contras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s rule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failure of its founding proposition of maintaining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big landlords and big bourgeoisie lies in its policies of dictatorship, civil war, and compromise, 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popular support, demonstrating that “those who lose the people’s support lose the country”. In the era of peaceful construction, the Party has achieved long-term governance by relying on the mass line, which is “the Party’s lifeline and fundamental line of work”, verifying that “to maintain the country is to maintain the people’s hearts”. Yimeng Spirit “plays a highly significant enlightening role”, indicating that at all times and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the people’s standpoint “without change”, maintain the awareness of serving the people “without change”, and uphol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masses “without abandonment”.

Key words: the people being the country; Yimeng Spirit; Party-masses relationship; mass work

(责任编辑 雪 箫)